

政协文史资料征集与口述史实践

曹幸穗

1959年4月29日，全国政协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了一次“敬老茶话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倡议，希望年长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三亲”经历（即亲历、亲见、亲闻）口述或撰写出来。各级政协委员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口述或撰写了数万篇包罗万象的三亲文稿，总数达到20多亿字，其中全国政协文史委收藏的有4亿字。40年后的1998年5月，李瑞环主席在政协主席会议上提出，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把整理收存的文史资料作为工作重点，下大力气做好清理、挖掘和抢救工作。文史委立即组织力量，着手对全国政协收藏的文史资料存稿进行整理编纂。

1998年至2013年，我担任了第九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十届改称“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因此一开始就参与了文史资料存稿的甄选归类、辨读筛选、内容审定和文字校勘等编务作业。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分设《晚清、北洋卷》（上下）、《东征北伐、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卷》（上下）、《日伪政权、全面内战卷》（上中下）、《政府、政党、特工组织卷》（上下）、《军事机构卷》（上下）、《军事派系卷》（上下）、《军政人物卷》（上下）、《经济卷》（上下）、《文化、教育、社会卷》以及《目录汇编卷》等10卷26册。根据文史委办公会的任务分工，我具体参与《日伪政权卷》（上册）和《经济卷》（上下册）共360多万字的选编审校工作。

在编辑审稿工作中，我切身感受到政协文史资料不仅极具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极具诱人的历史趣味。例如，我在审读《经济卷》“旧海关史事”的成捆成堆的资料时，经常进入“妙趣横生，如痴如醉”的状态，彻夜翻阅而不知累。读历史而能读出如此兴致，这正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于是我开始关注口述史的学术领域，开始对类似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大型口述史活动进行理性思考。2002年《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出版问世后，我写了一篇“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的小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四期上。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回溯。

一、作为新兴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是指以访谈、口述的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

口述史并不是今人的发明，自古有之，代不乏人。司马迁作《史记》，就使用了不少口述史料。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写道：“采据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里的“询之老成”一句，就说明他也采用了口述史的办法。

但是，学界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Oral History）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艾伦·芮文斯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他通过访谈笔录方式搜集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口述回忆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口述史档案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组织实施的“福特汽车公司访谈回忆资料”，遍访该公司的老板员工和相关人士，记录资料长达两万多页，是十分珍贵的企业史料。此后，芮文斯的同事及其继任者们继续了他的工作。特别是1958年开始对当时寓居美国的原中国军政要员的访谈，汇集了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口述史料，使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名扬学坛的口述史基地，并由此扩大了口述史的学术影响，推动了口述史的发展。

1967年美国成立“口述史协会”，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至此，口述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个富于生气、富于活力的新兴学科。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口述史的学术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取得了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大量学术成果。

为了借鉴国际学术界的口述史活动经验，2008年1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就口述史进行专题访问交流。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得到我国驻温哥华领事馆、驻纽约总领事馆、驻美国大使馆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先后访问了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中心举办的加拿大原住民和移民史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口述史协会、美国纽约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资料档案馆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罗维尔市口述史纺织博物馆等单位。通过学术访谈和实地考察，主客双方围绕口述史研究的价值与口述资料的使用，以及口述史访谈设计、访谈技巧、录音整理、受访者隐私权保护等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回国后，考察团呈报的考察报告提出：要借鉴加拿大和美国的口述史博物馆建设经验，加快建设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馆应当成为收藏、展示政协文史资料的手稿、图片、录音、录像和各级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图书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适应征集

对象、征集机制、征集手段的时代变化。要研究和借鉴口述史学的新途径、新形式，努力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不断把文史资料工作推向前进。

二、中国的口述史进展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口述史活动不仅涵盖丰富的主题，还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不仅体现口述史在文化传承、历史记录和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还展现了中国口述史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上的积极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体系建设，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话语体系。先后开展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口传史料的抢救性发掘，以及“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写作运动等。改革开放后，口述史引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在题材和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拓展，涵盖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当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口述史在传播形式和应用领域上不断创新，呈现出多元化、影像化等新趋势。

近年来，口述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出版了多部口述史专著，涵盖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群体等多个领域。例如，《一颗党心耀百年：百名共产党员口述历史》《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中国轻纺城发展口述史》等。《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的“多维视域下的口述历史”圆桌论坛，探讨了口述史的规范、个人和社会的记忆等问题。口述史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见诸文坛书报的口述史成果众多。谨择数例，以观其盛。

一是文化传承与技艺保护类。《国礼背后的中国技艺》，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礼背后的中国工匠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复兴与发展；《金陵医派名家口述史》，以口述实录和影像记录的方式，记录金陵医派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二是地方文化与社区记忆类。《口述襄阳》，记录樊城历史街区原住民的口述历史，出版了《口述老樊城》，持续开展相关社区口述史项目；《库村口述历史》，记录了浙江泰顺库村1200多年的历史，涵盖家族、建筑、手工艺和民俗文化等内容；《乡见系列口述史工作坊》，关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口述史记录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冯骥才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

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推动了口述史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理论建构和传承的发展。《海南岛疍家人口述史》，记录三亚市榆港社区疍家人的生活与文化，展现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与渔村生活。

四是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类。《天才捕手计划》，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各领域优秀从业者的故事故事，并改编为影视作品；《口述童年》，以访谈形式记录不同职业和年龄段人群的童年记忆，旨在为童年立传，支持成长。

五是教育与学术探索类。中国传媒大学的“重温历史：记忆之场与口述访谈”通识游学课程，结合实地调研与口述史教学，探索口述史在教育中的应用；南京师范大学的洪江 918 厂口述史：通过口述史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工业记忆。

六是国际交流与多元文化类。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口述史活动，2024 年的国际周以“用记忆触摸历史”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

以上这些项目和活动不仅体现了口述史在文化传承、历史记录和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还展现了中国口述史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上的积极探索。

三、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资料与传统史学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其他史料所不能替代的。口述史的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的“四化”。

一是人事记载的平民化。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以及与这些社会上层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留下的史料很少。因此，对于过往历史的平民百姓，历史学家很难深谙其详。口述史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而且也注目于市井街巷，黎民百姓，寻常人家。例如上文提到的芮文斯关于福特汽车公司员工访谈、全国政协委员的旧中国海关职员回忆资料等等，都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实情，记录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他们对世事百态的看法。如果没有口述史的访谈方式，他们也许永远只是过眼烟云，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踪迹，后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认识他们。

二是史事记载的细节化。传统史学所赖以利用的各种史料，无论是关于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常常是正面的多，负面的少；台前的多，台后的少；表面的多，背面的少；显现的多，隐藏的少；粗疏的多，细微的少；强者的多，弱者的

少。如此等等。总之，传统史料留下来的只是事物事件的一部分，或颂或贬，或捧或伐，都只是其中的一面，很难窥见真实的全部。例如，人们可以查阅到影响过历史进程的某次重要会议的决议或相关文献，但无法从这些可见的资料中看到，围绕这次会议的派系角逐，权力纷争，人际纠葛。通常，隐藏于事件背后的真相，非当局者无以知晓，人们能见到的只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但是，当事过境迁之后，当那些事关江山社稷、动辄地覆天翻的重大事件成为“渔樵夜话”之后，可以通过“口述史”的办法，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者，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甚至见不得人的历史信息和盘托出，据此才得以了解一部接近真实的历史。正如同人们熟悉地上的林木，却很少知道深埋地下的根须。口述史暴露了历史人事的“根须”和“细节”，从此得以认识作为一棵完整植株的全部。在许多场合，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常常不是昂然飘扬的地上枝叶，而是日渐腐朽的地下根须；不是台前的宏篇大论，而是台后悄然而来的小动作。因此，历史学既要关注地上的和台前的，也要关注地下的和台后的。口述史提供了后者的信息。前面提到的全国政协所藏的反映旧中国方方面面的文史资料，相当部分就具有这种“敞开历史表象的背后”的玄妙之音，闻之何等畅快。

三是史料载体的多样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载体，迄今先后出现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将这许多传承手段集中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客体之上，正是口述史特有的专长。一份口述史资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访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由于是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口述史工作者能够事先准备好摄影、照相、录音等现代器材，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再加上受访者提供的某些手稿、用品之类，就是“五传”具备了。如此多样的记录媒体集中于一个受访者身上，无论受访者是伟人贤达还是市井庶民，其“记忆整体”都远超乎单一媒体之上。

四是史料组合的系列化。口述史是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是将存藏于受访人记忆中的“活史料”，物化为多媒体史料的“主动存史”行为。因此，作为口述史家的主访人就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多客体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换言之，口述史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

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主动存史的长处在于能够比较容易做到史料组合的系列化。举例说，前述的“福特汽车公司百年发达史”的口述史访谈，可以向一切与该公司有关的人们，包括曾在公司工作过的职员、产品销售商、用户、政府管理者等等进行口述史规则下的众多寻访，从而获得系列化的活生生的关于该公司的史料，构成关于一家公司的完整史料库。又如，全国政协收藏的“旧海关史事”文史资料，披露了大量通常情况下“不为人知”的寻访史料，口述了旧中国海关的种种舞弊、挥霍、受贿甚至鲸吞的“社会记忆”。如果缺少了口述史的真实记忆，就不可能写出一部真实完整的海关史。

四、口述史的规范

在学术分科上，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是“学科”，就得遵从科学的逻辑，就得有一套合符学术范式的“游戏规则”。国内目前开展口述史的活动很活跃，但是，总体上说，我们对口述史的理论思考还不够，还没有成熟的本土化的“口述史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这种学科状况也许会阻碍口述史的健康成长和扩展普及。在此，谨以参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审工作的体会，提出“口述史五原则”，以祈业内专家教正。

一是史学单元原则。口述史的目标是通过寻访记录来搜集历史人物事件的相关史料，以便真实地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和留存历史。因此，一个具体的口述史项目，必须构成历史学意义上的完整单元。我为此杜撰了一个名词，称之为“史学单元”。一个“史学单元”由许多采访单元组成。它应当包含较大的学术容量，并且自成体系。比如，旧中国海关口述回忆资料，就包括有不同层级的地方海关、不同时代的海关衙署、不同职级的海关职员、不同岗位的业务规程等等数十人的回忆资料，由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性很强、故事感很鲜活的“旧海关画相”。如果每个单元只采访一两个受访者，就不能真实反映“单元”的全貌，就不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集团性的口述史料。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开展具有一定学术容量的、包罗项目多数采访对象的口述史项目。

二是回忆性陈述原则。为了实现口述史的学术目标，它的工作内容应当偏重于搜集一般不易被记录留存的史料。这类史料大多属于前文提到的“负面的、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细微的、弱者的”史料。而要从受访者口中获得这类史

料，访谈的内容或人事就不能与受访者现实状况存在利害关系。否则，受访者会因为顾及自身的利益而回避某些重要的话题，或者对访谈内容只作轻描淡写的回答，这样就达不到口述史所要实现的目标。现代口述史创始人艾伦·芮文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着力搜集的两个大的专题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口述回忆资料”和“福特汽车公司访谈回忆资料”。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了口述史料的“回忆性”。为什么要特指“回忆资料”？因为回忆就是涉访人事的过去时态。口述史不同于新闻采访，也不同于传记作家的人物专访。口述史侧重于受访者对过去人事的真实回忆。只有在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只有在“昔日当事者，而今局外人”的现实状态之下，受访者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回忆其亲历、亲见、亲闻，并且道出鲜为人知的故旧往事。例如，假若李宗仁还是桂系军阀司令官，还是国民政府代总统，他不可能以一个凡人甚或一个“弱者”的心态来面对口述史家陈述他的人生经历。在这一点上，口述史的“回忆性陈述原则”也可以称为“非利害性原则”。

三是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原则。一份口述史料的归宿，通常会涉及四类人：一是主访者，二是受访者，三是史料保存者，四是史料利用者。但它的“主人”应是受访者。因此，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和隐私必须贯穿于口述史活动的全过程。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访谈方式、时间地点、记录方式（笔录、录音、摄影、录像）等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辑之后，必须经受访者审阅修改或者经他本人授权审阅才能定稿。成稿后的资料及原始资料，要将保存收藏的方式告知受访者并经他本人或授权同意。资料保存者要向受访者书面承诺资料的物化文稿和内容信息的安全。对于口述史料的刊行和使用，主访者与受访者要有明确的协议。如果含有公开限期的协议条款（如5年、10年或受访人去世之后等），则在协议年限内，非经受访者同意不得公开调阅、引用和出版。如经受访者同意，准许口述资料作收益性使用（出版发售、收费调阅、影视改编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收益），其收益应由主访者与受访者、整理保存者合理分享。总之，口述资料的形成比较复杂，全部工作始终都应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约束。

四是忠实行口述记录原则。口述史资料是主访者与受访者协同完成的学术成果，因此确定各有关参与者对资料内容的处置权是保证资料质量和真实程度的前提条件。有必要分清各参与者在口述史料形成过程中的主次。口述史的第一主

体是受访者，因此受访者口述的原始记录至为重要。其后的整理加工都应遵循忠实于口述记录的原则。但是，口述史工作实践表明，在多数情况下，口述史访谈的原始记录资料是比较杂乱的，不具学术逻辑的，需要经过校正、拼接、编辑等后续环节。但除了明显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等方面错讹可以注释改正外，主访者或加工者只能在理顺文法、调理逻辑结构等“技术”层面上进行整理加工。主访人不能在加工过程中添加口述记录以外的实质性内容，当然也不能删除口述记录中的实质性内容，哪怕受访者的陈述有悖常理常识，观点离奇，述说怪异，用词生僻，一般情况下也应保留。这正是口述史资料的“原始性”价值。总之，口述史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有一个忠实于受访者的原则。否则，口述史与历史演义、人物传记、史学论著、文学创作就容易混为一谈，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五口述资料整体性收藏原则。搜集口述史资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存史”，出版公布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全国政协收藏的文史资料，也只有 15% 左右公开出版，大部分资料是作为历史档案收藏的，留待后人研究利用的。在口述史学术实践中看到，一个“史学单元”的口述史项目，常常形成庞大的多媒体的访谈资料群。原则上，一个项目的资料应当专函专柜收藏，以便查阅利用。但出于长期保存所必须的技术设施的要求，对不同载体质地的资料需要进行分别甚至分室收藏。例如，纸质资料、照片资料、磁性音像资料以及采访中受访人提供的具有历史事件意义的其他材质物品资料的保存收藏，就需要使用专门的设施设备。这时候，编写一份详细的互见式索引目录至为重要。利用者可以从任何一件资料的“互见式索引”中便捷地检索到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这样一来，即使一个“史学单元”的口述史资料载体多样，分室收藏，也不失其整体性。

五、新时代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

新时代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点征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领域、重大事件和重要代表人物的“三亲”史料。这一工作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2022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期间，叶小文委员提交了《关于立

项录制政协委员口述史的提案》，提出将“政协委员口述史”作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对象，为研究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保存珍贵历史资料。

2022年6月23日至24日，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强调，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特色工作和重要优势。口述史作为文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生动再现历史细节，为存史资政提供丰富素材。人民政协的口述史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方法，加强研究阐释，用史料说话，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会议对口述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口述史在采集、整理、研究等环节更加规范和科学。通过口述史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引导人们更好地认识和认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在社会层面，口述史征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特别是重大改革实践、经济发展成就、民生改善、脱贫攻坚、“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推进过程的“三亲”史料。

征集对象包括各级政协委员，尤其是长期参与政协工作的老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港澳台侨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那些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亲身经历的人士。征集活动要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尊重历史原貌，涵盖背景、过程和影响，不虚构、不溢美、不贬损，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社会的凝心聚力和价值认同。